

主持人语:故宫与大运河,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创造精神的体现,是人类文明史耀眼的瑰宝,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遗产。故宫与大运河,以静态和活态的方式呈现出中华文化悠久的历史、厚重的底蕴,在静穆与流动中呈现无穷的魅力,她们共同映照世界遗产绚丽的篇章。《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拟从2017年始开辟故宫与大运河研究专栏,旨在为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尽绵薄之力,对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精华有所担当。故宫与大运河是天然地联结在一起的世界遗产载体,她们之间有着血脉相连、薪火相传的关系。对故宫与大运河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将为复兴、光大中华文明,更有效地保护世界遗产产生积极的影响。《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一家高品质的学术期刊,曾开设儒佛道与地域文化、江南文化、艺术人类学与遗产保护等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特色栏目,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同时,在过往的几年,学报陆续刊发过有关故宫和大运河的学术论文,有良好的反响。这为故宫与大运河栏目的开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着民族复兴,为文化自觉与自信,期盼《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不遗余力地为世界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作出应有的贡献!也希望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支持该栏目的建设,以彰显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之光!

关于故宫学的概念与对象

郑欣森

(故宫博物院 故宫研究院,北京 100009)

[摘要] 故宫学是以故宫及其历史文化内涵为研究对象,集整理、研究、保护与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学问和学科。故宫学的研究对象包括故宫(紫禁城)、故宫文物和故宫博物院,三者相互依存,构成一个文化整体。紫禁城是故宫学的核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代宫殿以及其他明清皇家建筑的关系密切;故宫文物多为中国历代皇家收藏及明清两代皇家陈设物品,与紫禁城宫殿融为一体;故宫博物院以紫禁城宫殿及其皇家收藏为基础,承担故宫建筑、文物、典籍、档案的保管、开放及传播等职责。

[关键词] 故宫学;紫禁城;故宫文物;故宫博物院;研究对象;关系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7)01-0005-11

一、故宫学的学术概念

所谓“故宫”,指的是旧时宫殿,乾隆皇帝、嘉庆皇帝在东巡盛京(沈阳)宫殿的诗中,都用过“故宫”一词^①。现在的“故宫”称谓,通常专指北京故宫,即明清两代皇宫紫禁城。紫禁城由帝制时期的皇宫转化为公共博物馆,其中包含了“国体变更”的革命意义。今天人们说到“故宫”,既指紫禁城建筑,也指故宫博物院。

什么是故宫学?概言之,故宫学是以故宫及其历史文化内涵为研究对象,集整理、研究、保护与展

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学问和学科。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别:狭义的故宫学是指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独立学科,广义的故宫学是一门知识或学问的集合。

二、故宫学的研究对象

从故宫学的概念出发,其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故宫(紫禁城)、故宫文物、故宫博物院三个方面。

1. 故宫(紫禁城)

古代皇宫是禁地,又有紫微垣为天帝所居的神话,故称宫城为“紫禁城”^②。紫禁城位于北京城内中部,从明永乐十九年(1421)至清宣统三年(1911)一直是明清两朝的皇宫,先后有明代14位和清代

[收稿日期] 2016-12-28

[作者简介] 郑鑫森(1947—),男,陕西澄城县人,原文化部副部长、原故宫博物院院长。故宫博物院故宫研究院院长。

10 位皇帝在此执政,诸多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与这一空间紧密联系,是见证明清之际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历史场所。1912 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故宫”一词逐渐代替“紫禁城”,专指明清时期的旧宫殿遗址。1925 年故宫博物院建院后,“故宫”成为紫禁城宫殿遗址和故宫博物院的简称。故宫城墙以内的面积达到 72 万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 16.7 万平方米。目前,故宫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

建筑是实用艺术的典范,从一个侧面展示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伟大的建筑往往成为一个城市、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象征物。中国建筑与其文明一样悠久而辉煌。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古代建筑是“皇宮本位”的建筑体系,宫殿建筑是最能代表中国建筑风格 and 成就的类型。故宫则是中国古代宫殿发展的集大成者,是我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现存的唯一实例和最高典范,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中最辉煌的篇章。

紫禁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文化意义,体现了“皇权至上”的伦理思想。它的规划设计是附会封建宗法礼制的,继承了传统的宫城、内城、外城的三重城制度,居都城中央。总体规划布局仍可见“五门三朝”“前朝后寝”“左祖(太庙)右社(社稷坛)”,体现儒家的理想和封建礼制。故宫宏大壮丽,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巩固人间社会政治秩序的特点,特别是体现统治者的权威与财富,也象征着封建王朝的强大。

故宫庞大的建筑群体,明清时期既是帝王统治国家、日理万机的政治中心,也是其与皇室人员居住生活的地方,因此紫禁城内就有一系列满足各种使用需要的建筑和设施:有处理朝端大政及举行大典的殿堂,有为朝政服务机构的官署,有供皇帝、皇族及为他们直接服务人群居住和活动的处所,有皇帝、皇族进行文化活动的书房、戏台、花园、坛庙、佛堂、道场,并有宫中日常使用的各种什物的制造场地等。对于这些复杂多样的建筑和设施,紫禁城采用严格对称的院落式布局,按使用功能分区,依用途和重要程度有等差、有节奏地安排建筑群的体量和空间形式,代表中国古代建筑组群布局的最高水

平。故宫建成以后,虽然新建改建工程很多,但紫禁城内建筑的总体布局仍然保持着明初始建时的格局。现在的紫禁城实际上是明清两朝文化的结晶。

故宫在历史上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既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威权的反映,也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重要象征,是一个政治符号。在中国历史上,坚持传统的宫殿制度又与政权的继承性、正统性联系在一起。因而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政权,为求争取汉族上层分子的支持与合作并减少汉族民众的反抗,在所建政权的形式和宫殿及都城、礼仪等典章制度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比附、效法汉族传统,尊崇儒家,以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元新建的大都及宫殿就是如此,而清人则完全使用了明朝的宫殿。当然,历代在宫殿建设上也会有其自身的一些特色,但基本格局则是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

“北京故宫是中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的最高典范。它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后期发展、特别是礼制文化和宫廷文化提供了独特的见证。在建筑群体布局、空间序列设计上,它传承和凝练了轴线布局、中心对称、前朝后寝等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和宫城建设传统特征,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制度的典范。其宫殿建筑技术与艺术反映了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最高成就,对清朝 300 年间的中国官式建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宫内的宗教建筑、特别是一系列的皇家佛堂建筑汲取了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见证了 14 世纪之后满、汉、蒙、藏等民族在建筑艺术上的融汇与交流。同时,它所拥有的上百万件的珍贵皇家藏品、皇家生活用具以及大量古代工程技术的文字、图纸、烫样等档案载体,见证了中国明清时期的宫廷文化和典章制度。”^③这是自 1987 年故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故宫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全面评述。

从故宫学的角度来看,要全面认识故宫宫殿的内涵和价值,还必须树立“大故宫”概念。“大故宫”概念是近年来故宫学研究所形成的一个共识,即从整体上理解紫禁城建筑与相关宫廷建筑及其之间的联系。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政治

① 如乾隆八年(1743)乾隆帝初次东巡盛京,就有题为《故宫咏烛》《故宫侍皇太后宴》《故宫览章奏》等诗作。

② 明初营建中都、南京和北京宫阙时,将宫城称皇城,并将宫城外的禁垣包括在皇城范围内。至明万历时,将皇城改称宫城或紫禁城,将禁垣改称皇城。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八一载:“自午门至玄武门,俱宫城门”,承天、大明等“六门俱皇城门”;又载“内,紫禁城起午门,历东华、西华、玄武三门”。中华书局,1989 年。《明史·地理志一》亦称宫城为紫禁城,宫城之外为皇城。

③ 第 36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文件 WHC-12/36.COM/8E。

特征,宫廷具有宫室和朝廷双重含义。宫廷的地理范围,并不局限于宫城之内。完整的宫廷建筑,既要有宫殿,又必须有坛庙、陵寝以及供王室使用的园囿、行宫等。这种源远流长的礼制观念充分体现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

在中华文明史上,商周继夏代成为礼制高度发达的社会。商周礼制在考古学中反映最突出的是祭祀之礼,如《国语·鲁语上》所载:“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对祖先的庙祭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社祭是其主要表现。据考古发掘,殷墟内用于祭祀的宗庙性建筑是相当庞大的,这与殷墟卜辞大量记有祭祖的内容可以相互印证。陕西岐山周原发现的周天子宗庙,其建筑遗址与文献记载的宗庙布局比较一致,是寝、庙相连的祭祀建筑。除对祖先的庙祭外,比较重要的当属对天地诸神的社祭。社又谓社稷,是祭祀土谷神的地方,宗庙、社稷象征整个国家。商周的丧葬之礼在考古学中也有充分的反映。商王室贵族祭祖除了庙祭外,王陵区也成了举行祭祖之礼的重要场所。周代的丧葬制度更加体现了贵族之间的宗法关系和等级关系。^[1]

明清两代宫廷建筑的主体,是以皇帝居住和理政的紫禁城为核心,还包括以祖社与天坛为代表的礼制建筑以及陵寝,以及其他从属性宫廷建筑。作为明清宫城的故宫虽然只有近100万平方米(包括护城河)的范围,但作为完整的明清时期的宫廷建筑文化遗产,其范围则十分宽广。宫城以外的一些宫廷建筑和设施与紫禁城有着直接的或密切的联系,它们或因传统王朝的营建及宫廷礼制的规定而建,或因王朝处理政务的需要而设。中国历朝几乎都在中央政权机构内设立管理皇家宫室、坛庙、陵寝以及城郭等工程的设计、施工部门,即所谓的工官制度。明朝工部所属有营缮司,清朝也设有工部,但宫室、园囿的修造属内务府。因此,以紫禁城为主体的明清宫廷建筑是一个整体,宫室、坛庙、陵寝、园囿、寺观、行宫等,是一个有统一规划、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的庞大体系。从建筑布局上来说,北京皇城就是以紫禁城为中心展开规划设计的,太庙、社稷坛、西苑三海、景山、大高玄殿、皇史宬、中央衙署等在其四周分布,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坛庙在其四周散设。西郊的三山五园、散布京城的皇家寺观以及皇家陵寝、各地行宫等,无不与紫禁城关系密切。

2. 故宫文物

如前所述,紫禁城是宫廷建筑的核心代表,与

其相关的明清皇家建筑形成一个文化整体。因此,宫廷的范围有狭、广二义:狭义的宫廷即指紫禁城建筑群,广义的宫廷则指以紫禁城为主体的整个明清皇家建筑群。这些建筑空间内所藏文物皆与宫廷有关,例如沈阳故宫的文物,大多是从紫禁城移运过去的。尤其是乾隆年间,大量宫廷珍品由北京向盛京运送,乾隆四十四年(1779)拨送康、雍、乾年款各色瓷器10万件,乾隆五十二年(1787)又拨送御制书画、历代名家书画数百件等^[2]。在乾隆帝下令编纂的“西清四鉴”中,收录了盛京故宫的900件青铜器。又如圆明园所藏部分书画(后被英法联军劫掠或损毁)为《石渠宝笈》所著录,最初存放于紫禁城内。因此,与紫禁城关系密切的皇家建筑,例如沈阳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颐和园等处都曾有过丰富的文物收藏,构成宫廷文物的一部分。其中,宫廷文物收藏最集中、最丰富、最重要的地点是紫禁城,紫禁城文物收藏又集中于内廷,由清廷内务府总管。本书中所述“故宫文物”,以紫禁城文物藏品为主,也涉及到其他宫廷建筑收藏的文物。

故宫文物包含两类:一类是传统的文物,如铜、瓷、书画、文玩及其他工艺品等,它们一直是作为艺术品而收藏的;另一类是反映宫廷典章制度以及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物品,大多是当时的实用之物,因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在今天也成为珍贵的文物。我们这里把前一类称为“古代艺术珍品”,后一类称为“宫廷历史文物”,再加上图书典籍和明清档案,统称为“故宫文物”,都是可移动文物。

(1) 古代艺术珍品

收藏作为一种活动,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现代重大考古发现证明了史前人类收藏行为的存在。从商代起,王室就重视文物的搜集和保存。殷商的文物多集中于宗庙。周代王室文物、珍品收藏之处名曰“天府”“玉府”,并有专职官员负责管理。汉朝的“天禄”、“石渠”和“兰台”,则是汉宫贮藏珍贵文物及图书之所。到宋徽宗时,收藏尤为丰富,《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就是记载宋朝宣和内府收藏的书画鼎彝等珍品的目录。清代帝王重视文物收藏,特别是乾隆皇帝更使宫廷收藏达到了极盛。后来,随着国势日衰,外患频仍,宫廷收藏屡遭厄运,大量珍贵文物遭遇劫掠、毁损和流失,但仍留存下相当丰富的文物藏品,成为中华历史文化的实物见证与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清宫古代艺术珍品收藏,以书画、青铜器、陶瓷为大宗。

清宫书画中国书画是中华民族文明史所产生的艺术结晶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一种物化见证。中国宫廷书画收藏始自汉代,历经魏晋、唐宋、元明,在乾隆年间进行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艺术品蒐集活动中,存世的唐、宋、元、明名画,几乎收罗殆尽。这是继宋徽宗宣和内府后的最大一次集中。乾隆皇帝在自己处理日常政务的养心殿居所中,辟“三希堂”专室存放王珣的《伯远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这三件晋人名迹。他为此写有《三希堂记》,认为这三件书迹不仅是中国书法的“希世之珍”,而且是分别经过宋、金、元诸代皇室收藏的“内府秘笈”,三帖的重聚因此就有着非凡的意义:“今其墨迹经数千百年治乱兴衰存亡离合之余,适然荟萃于一堂,虽丰城之剑、合浦之珠无以踰此。”他又在建福宫花园静怡轩辟出专室存放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和传为宋李公麟的《潇湘卧游图》、《蜀川胜概图》和《九歌图》,并命名曰“四美具”,在御题《“四美具”赞》中,一再强调“剑合珠还”之意,亦足见乾隆皇帝的志得意满及其收藏的千古之盛。清内府所藏的书画作品,在乾隆朝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与分类编目,历经74年之久,编纂成《秘殿珠林》与《石渠宝笈》两部巨著,共收录上起魏晋、下至清代中期近两千年的书画作品1万余件。

清宫珍藏书画虽然有所散佚,有所损毁,但仍留下了相当重要的部分,并比较集中地保存在北京和台北两座故宫博物院中。可以说,两院荟萃了中国法书墨迹及绘画作品的精华,从中可见清宫书画收藏的基本风貌。其中有相当多的名迹巨品,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中国书法史、绘画史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古代书画史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清宫青铜器中国是世界上较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文明古国之一,其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形成,经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大约经历了15个世纪。中国青铜器的制造和发展,历代绵延不断,但其对社会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在先秦时代。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的鲜明民族特色,突出表现在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上。早期青铜器曾作为王权的象征物而存于世。传说夏禹铸九鼎,历商至周,以为传国之宝,鼎移则王朝易主。鼎彝或列于宗庙,或随葬于墓室,称为“礼器”,是先秦贵族等级身份的标志。用青铜器标识王权及贵族身份,并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记录历史,是早期中华民族所独创的文化成果,它是人类青铜时代文明达到鼎盛的伟大标志物。此后,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

收集保存祖先这一光辉遗迹。自汉代以来,青铜礼乐器时有出土,其上威严的纹饰,雄伟的气度,深得帝王之心,被视为国之祥瑞。汉武帝因得到一个古鼎遂改元为元鼎。于是官民贡献于上,皇室搜求于下,逐渐成为皇家的重要典藏。宋代曾集宫中所藏编成《宣和博古图》,收器凡839件。

清代乾隆年间,宫廷青铜器收藏相当丰富。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皇帝命将宫廷收藏的鼎、尊、彝、鬲等古青铜器,仿宋代《宣和博古图》样式,编成《西清古鉴》40卷,收铜器1529件,其中有铭铜器586件,绘制器型、款识,并援据经典,一一考证,十六年(1751)成书,收入《四库全书》。乾隆十六年至四十六年(1781)间又编有《宁寿鉴古》,收铜器701件,其中有铭者144件。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八年(1793)编纂《西清续鉴》甲编、乙编,甲编所收为内府续得诸器,共944件(另附录唐以后杂器31件),其中有铭铜器257件;乙编收盛京铜器900件,其中有铭铜器192件。“西清四鉴”共收录铜器4074件(另附录31件),其中有铭铜器没有发现重出者,共计1179件,此外有铭铜镜114件。清宫所藏铜器当然不止这些,嘉庆以后所收的未再著录,热河行宫、颐和园等也有不少存藏。“西清四鉴”虽然在辨伪、断代、释文、考证等方面尚未达到宋代人的水平,但仍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不仅在当时推动了金石学的发展,其中保存的珍贵资料,时至今日仍是十分难得、无可替代的。

清宫陶瓷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中国有长达20000多年的陶瓷发展史。始烧于夏商之际的原始青瓷、成熟于东汉时期的瓷器是中国古代先民的伟大发现,是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此后中国的瓷器经历了唐宋时期的蓬勃发展和元明清的鼎盛时期,同时向东西方传输,影响世界瓷器制造业的发展。宫廷使用和收藏陶瓷器至迟可上溯至唐朝。唐、五代时,朝廷曾旨令一些制瓷质地优良的窑场烧造贡瓷。宋代,朝廷先是令一些制瓷质量较好的窑场如定窑、耀州窑等烧造贡瓷,而后设立汝窑、钧窑、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等官府瓷窑场,专门烧造宫廷用瓷。至明代初期,皇室已收藏了数量可观的宋代名窑瓷器。明清两代朝廷均在景德镇设御窑厂,并选派督陶官驻厂专理或命地方监造,不惜工本,大量烧造宫廷用瓷。清代的帝王,特别是康、雍、乾三帝都比较好瓷器。康熙本人重视西洋的科学技术,著名的珐琅彩品种,就是在康熙时引进国外彩料创制的,它为粉彩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雍正十分重视瓷器的质量,他采用重奖

制瓷工人的办法,促使制瓷质量的提高。乾隆酷爱各类工艺品,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这些都使官窑瓷器的生产得以迅速发展。^[3]

清宫收藏除过铜、瓷、书画外,尚有其他众多的艺术品珍藏,主要有玉器、珐琅器、漆器、竹木牙角匏器、金银器、玻璃器、石鼓与石器、织绣书画、照片以及文房用具、鼻烟壶、珠宝盆景、成扇、古建筑文物等,可以说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各个主要门类,而且有的是宫中所特有。这些艺术品虽然也有很多流散,但其主要的部分仍然留存在北京故宫以及台北故宫。

紫禁城是世界上最丰富、最重要的中国古代艺术品的宝库。清宫收藏无比丰富精美,具有品级上、品类上、数量上的优势。论时代,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宋元明清;论范围,囊括了古代中国各个地域的文明精华,包容了汉族和古代许多少数民族的艺术精粹;论类别,包含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品的所有门类。它们都是世所公认的国宝,是文化艺术的至珍;其历史文化内涵更涉及建筑、园林、历史、地理、文献、文物、考古、美术、宗教、民族、礼俗等诸多学科,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具有突出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故宫庋藏的各主要类别文物,其本身就完整地记录了该类文物从萌生、发展到辉煌的文化链。以书法为例,故宫的藏品涵盖了从契刻到书写进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书法艺术的历程,藏品从甲骨文(后来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甲骨22463片,属于世界第三大甲骨收藏单位)、钟鼎文,直至晋朝开始形成书法艺术,此后,历朝各代的名家流派,几乎一应俱全。再以陶瓷为例,从新石器时代的黑陶、彩陶,直到两宋的五大名窑,元青花瓷,明代白瓷、釉里红、斗彩等,清代的粉彩和珐琅彩等;其他如玉器、铜器和许多工艺品等,也是如此。因此,故宫是一部浓缩的中华5000年文明史。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在故宫博物院的各类文物藏品里均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2) 宫廷历史文物

宫廷是封建社会国家的中枢,是朝廷的中心。故宫在491年中一直是明清两代的国家政治中心和24位皇帝的居所,在这些宫殿里曾发生过无数惊心动魄的军国大事、扑朔迷离的宫闱秘辛以及权力斗争的刀光剑影,有着数不清的历史故事。遗存至今的大量宫廷历史文物,过去都是实用之物,如卤簿仪仗、乐器舞具、宫廷冠服、八旗盔甲、武器装备、宗教文物、戏衣道具、药材药具、家具地毯以及外国文物等等,品类繁多,作为宫廷历史文化的见

证和载体,不仅是研究明清史的重要资料,而且是了解宫廷历史文化的珍贵实物,同样是具有相当价值的文物。

这些有关日常政务活动、文化生活、衣食住行的物品,也都与宫廷典章制度有关。典章制度是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用以设官分职、敷政治民及协调统治集团内部关系、规范统治方法的准则和法规,与一代王朝的治乱兴衰关系极大。其核心是王权的至高无上,是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清代统治者特别重视典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因此有清代会典、会典事例、各种则例、通典、通志、通考等典制专书(包括《皇朝礼器图式》)的官修并一再续修或重修。清宫遗存的大量藏品,即如日常的生活用品,都是典章制度的具体反映或与典制有关,涉及宗教、民族、印信、文书档案、采捕朝贡、礼制、乐制、服饰、车舆、仪卫、燕宴、科举、书籍与作品、天文历法、医疗、八旗制度、军需、宫殿、坛庙、陵寝、工程、建筑、作坊、帝后与宫廷、行宫园囿等各项制度。制度文化是文化的定型表现形态,它使文化具有外观的凝聚性、结构的稳定性和时间的连续性。^[4]通过对制度文化的深入研究,往往能够抓住文化中最为本质的内容,而故宫这些丰富的文物藏品,有助于对清代典章制度的深入研究。

例如,清代典制玺册包括国宝、官印、册封宝册、徽号宝册、谥号宝册五类。其中帝后玺印是皇权的象征。清代最重要的是代表皇权的清帝“二十五宝”,它是中国历代王朝所遗存的唯一一套代表皇权的御宝,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皇帝对当时所有皇帝宝玺加以整理和完善,确立了有清一代的皇帝宝玺制度:考定为二十五宝玺;确定了各玺的名称、尺寸、纽式和用途;统一篆刻,除第四方“皇帝之宝”为满文外,其余均用满汉两种文字篆刻,左为清篆,右为汉篆;固定二十五宝收藏于交泰殿。重新排定后的二十五宝,每一方御宝的用途都有明确规定,各有所用,集合起来,便代表和囊括了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各个方面。清代皇帝依靠这些御宝,得以发布各种文告,指令王朝的各个机构有效地运转,维系封建国家的延续。北京故宫藏有明清帝后玺印5000余件,占已知全部帝后玺印藏量的90%以上。其中典制玺册约占1/10。

再如,乾隆时期在宫中遍设佛堂,北京故宫至今仍完整地保留着一批清代藏传佛教殿堂。故宫原有独立佛堂35处、暖阁佛堂10处,其中雨花阁、宝华殿、宝相楼、吉云楼、佛日楼、梵华楼等20多处

至今保存比较完好,不仅建筑完整,而且室内保留的清代匾联、供案、神佛造像、佛塔、供器、法器、唐卡、壁画等基本维持原样。现存清宫佛堂的建造年代,除少数为明代遗留的佛殿如英华殿、和清初顺治康熙所建的慈宁宫后殿外,几乎全部为乾隆时期新建,或在旧建筑基础上改建的。每座佛堂供奉的主神不同,均有宗教崇拜的不同功用,其内的陈设布局依据格鲁派(黄教)教义,模拟西藏寺庙神殿,所以清宫佛堂内几乎囊括了西藏神殿中各类神像、神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前沙俄教授钢和泰(1877—1937),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曾拍摄了宝相楼的766尊佛像,又搜集了一套有360幅佛教人物画像的《诸佛菩萨圣像赞》,后由哈佛大学克拉克教授整理为《两种喇嘛教神系》一书出版,书中对这些佛像的梵藏汉名称做了较为完整的索引。这部书在藏传佛教图像学方面属于里程碑式的作品。

又如“样式雷”图档。“样式雷”是清代200多年间主持皇家建筑设计的雷姓世家的誉称,作为我国古代科技史上成就卓然的杰出代表,其建筑创作涵盖了都城、宫殿、园林、坛庙、陵寝、府邸、工厂、学堂等皇家建筑。迄今传世的样式雷图档近2万件。这些图档涉及相关建筑选址、规划设计和施工等多方面的详情细节,对清史、古代科技史尤其是建筑史(包括图学史、建筑设计思想、理论和方法,施工技术和管理制度等),以及相关文物建筑保护和研究,均具有巨大价值与意义。2007年,“中国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对宫廷历史文物价值的认识,既是一个文物保护理念问题,也牵涉到对于故宫价值、故宫博物院性质的认识问题。故宫是491年间明清两代24位皇帝在此生活过的皇宫,是封建时代国家的中枢,保存至今的各种宫廷收藏和遗物都是皇帝及皇室生活、活动的见证。这是故宫的最大特色,也是故宫的特殊价值,而保护好一个完整的故宫则是故宫博物院的使命。

过去,不少宫廷历史文物长期未被视为文物,或仅列为“文物资料”,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些遗物存在缺乏艺术性、不完整性、大量重复性、时代晚近性、材质普通性等问题。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2万多件清代帝后的书画,数千件绘画包括了顺治、乾隆、嘉庆、道光、光绪、溥仪等皇帝和慈禧、端康、隆裕等后妃的作品,又以乾隆、慈禧为最多,仅乾隆皇帝的就有1600余件,万余件书法包括了自顺治

帝到宣统帝的10位清代皇帝的书迹,乃至慈禧、隆裕的墨迹,其中乾隆皇帝书法多达1万多件。这些作品有一部分是从避暑山庄、圆明园以及玉泉山等地行宫殿堂内揭下的贴落,以殿座为单位卷成一包运抵紫禁城。此部分帝后书画大多都有黄条纸注明何时何地“请下”的字样,保存非常完整。但是,受观念限制,过去未将其视为文物,甚至未纳入“文物资料”之列,而现在它们的重要史料价值逐步受到关注。书画本身就是艺术品,帝后的审美取向比文人的趣味更能影响当时的文艺潮流。同时,它们又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尤其是对于皇帝和后妃们艺术、文化、思想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由于这些作者身份的特殊,社会上流传量小,现在收藏界对此也颇为关注。

宫廷遗存中有的重复品多。一般来说,文物的存量与价值成反比,某类文物的存量越少,其中每件文物的价值就会相对提高。但是,故宫藏品的这个“多”,是就皇宫而言,从全国来说,则还是相当少的。例如,当时有大量八旗盔甲,现在保存很少,人们以为保存大量的重复品对个体的认知并无意义。今天来看,有了大量的重复品,才能体现出八旗的军威和气势。

文物不只是经济价值大的或者稀有的宝物,还包括一切反映人类历史文化的遗存。这些故宫宫廷文物是典章制度和宫廷生活的载体和反映,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和认识作用,不能简单用“古董”“古玩”的眼光去看待。故宫不只是“国宝”“精品”的荟萃之所,其一砖一瓦、一物一件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与生命。因此在故宫保护上必须树立“大文物”观念,即凡是能够反映宫廷历史文化的遗迹、遗物,都是故宫遗产的一个部分,都要重视,都要保护;或者说,清宫的所有遗存,没有不是文物的。故宫作为一个巨大的稀世之珍,囊括了所有古建筑、可移动文物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大文物”理念指导下,故宫博物院在2004至2010年的文物清理工作中对这些帝后书画及13万件清代钱币等进行了系统整理,将18万件资料藏品提升为文物,20余万件武英殿书版、“样式雷”烫样以及大量建筑构件等也纳入文物账进行管理。许多宫廷历史文物还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密切关系,对其展开研究更具有抢救性意义。例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乐器不仅有明代以前的,还有完整的清代宫廷朝政和生活中频繁使用的典制乐器、民族乐器和戏曲乐器等2300余件,其中以坛庙祭祀和殿陛朝会使用的典制乐器规格最高、数量最多,

代表了先秦以来中国历代王朝宫廷雅乐所用乐器的各种类型和形制,如祭祀和朝会中所用的中和韶乐,依“八音克谐”的传统,有编钟、编磬、琴、瑟、箫、笛、排箫、篪、埙、笙、搏拊、祝、敔等 16 种乐器,指挥器为麾,同时用乐舞生、歌生、执节掌麾者达数百人。“丹陛大乐”有戏竹、大鼓、方响、云锣、杖鼓、拍板、管、笙、笛、箫等。其中如搏拊、编钟、建鼓、方响、祝、敔等,后世已十分罕见。皇帝四种卤簿所用的“卤簿乐”乐器也为数可观,有大铜角、小铜角、金口角、金锣、铜鼓、花腔鼓、得胜鼓、铙、小钹、海笛等。虽然乐器保存完好,音乐却已消失。因此,如何研究、整理和抢救这些中国宫廷音乐,就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①。

(3) 图书典籍

清朝统治者以“稽古右文”自命,对图书典籍非常重视。清宫藏书是以明代皇室遗存为基础,经过数百年的访求、编刻、缮写,收藏了大量的珍贵图书,超越以前各代。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以《天禄琳琅》藏书、《宛委别藏》丛书、内阁大库藏书为代表的宋元明善本的珍藏。清宫藏书除前代皇室遗存外,还大力搜索购求天下遗书。纂修《明史》,搜采了大量明朝史志。开四库馆,共采访得书 13781 种。内外大臣、群儒进献自著或收藏的珍贵善本亦为数不少。皇宫荟萃了许多极其罕见的宋元明各代的珍本。《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尽毁于火后,又编成《天禄琳琅书目续编》,收宋至明各代刻本、影宋本、明抄本共 664 部、12258 册。可谓珠玉荟萃,为 200 余年前清代藏书的精华,其中不少珍稀宝籍经历了自宋迄清四个朝代的诸多藏书家之手,更有许多是流传有序极为罕见的古籍。《天禄琳琅书目》为我国第一部官修善本目录,在版本著录体例方面多有创见。《宛委别藏》共收书 165 种,多珍稀秘笈,罕见于公私著录,可补《四库全书》之阙。

第二,以明抄本《永乐大典》及清抄本《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为代表的抄本书。《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共 22937 卷(含目录、凡例 60 卷),分装 11095 册,约 3.7 亿字。全书收罗宏富,包括宋元前各类书达七八千种,元以前佚文

秘籍多赖以保存,对辑佚或校勘古籍有重要价值。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 3503 种,79337 卷,约 9.97 亿字,装订成 3.6 万册,6700 余函。它基本上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籍的精品,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保存、整理和传播中国古代文献的作用。通过《四库全书》,可以大致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思想文化。《四库全书》先后缮写七部,分藏内廷即故宫文渊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盛京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南三阁允许士子阅览,发挥了“嘉惠士林”的作用。

第三,以《古今图书集成》为代表的清代历朝内府纂修刊刻的图书,包括武英殿刻本、扬州诗局、扬州书局刻本和六部、院、监刊印的各种图书。清前期,清内务府主持编纂、刊刻和抄写了许多大部头的图书。康熙时把武英殿作为清代内府专门的修书、刻书机构。康熙一朝内府刻书约 50 多种,5000 多卷,在内容上门类齐全。修成多达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并于雍正时略事修订后以铜活字排印,堪称壮举。特别是《御制律历渊源》一书,不仅系统收集整理了明末清初传人我国的西方数学、天文学和音律学知识,也汇集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历算、音律方面的精华,并通过反复校算、实地测验而得出的数据,是一部反映当时中国这些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平的科学巨著。刊行之后广为流传,对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贯通,促进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康熙帝在编纂这部著作过程中付出了不少心力。他不但亲加改正,还自己动手编制各种数表,自称“数表一项,求之甚久,此一项算出后,经缮竣看得,较先前所修之表用之更易,更精致简练”^②。此外还编刻有《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子史精华》《全唐诗》等动辄上百乃至数百卷的大型典籍,特别是中国第一部带有经纬度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虽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才由内府用铜版印刷,但其编绘仍在康熙一朝。雍正帝在位时间较短,也编刊了几十种书,著名的有《朱批谕旨》360 卷、《骈字类编》240 卷(成书于康熙末)等。乾隆朝武英殿刻书亦臻高峰,内府大约刻了 150 多种大小不等的书,不算《清文翻译全藏经》,仍镌有 18000 余卷,如《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及先后敕

^① 韩国、越南的宫廷音乐则保护传承至今。2001 年,韩国首尔宗庙祭礼和宗庙祭礼乐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宗庙制度在朝鲜半岛最早由新罗从中国引进。韩国首尔宗庙每年在 5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举行祭祀朝鲜王朝君主和王妃的儒教仪式——宗庙祭礼。宗庙祭礼的音乐是朝鲜宫廷音乐的一种,被称为宗庙祭礼乐。2003 年,雅乐——越南宫廷音乐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宫廷雅乐诞生于后黎朝(1427—1789),在阮朝(1802—1945)形成体系和程式,定为王家音乐。作为王权和永恒的象征。越南从黎朝时有组织地输入中国明朝的宫廷音乐,对其初期宫廷乐的形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②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允祉奏发回之新表数使用有益等情形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

修的“三通”续作(《续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与“清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活动。目前存藏于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地的清内府刻书多达1400余种。

第四,以藏文《甘珠尔经》《清文翻译全藏经》为代表的满、蒙、藏等少数民族文字图书。清政权是中国东北少数民族满族所建立的全国性统一政权。清代官方,不仅用汉文字编纂各种文献,而且满语和满文作为清朝“国语”“国文”,也留下数量庞大的满文文献。此外出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需要,还用蒙古(包括畏吾尔体蒙文和托忒蒙文)、回、藏等边疆民族语言文字编纂了不少图书。清内府编译的满、蒙文图书,既有以满文直接编纂的满文书,也有用满文翻译汉文典籍或西洋图书,还有各种文字互译或转译,如先以藏文译梵文,再以蒙古文译藏文,尔后用满文译蒙古文。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清代编纂了系列化的大型满语词典《御制清文鉴》,这是语言文字划时代的成就。从康熙十二年(1673)始修《御制清文鉴》(用满文注释满洲语义)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的《清文合蒙古鉴》(满蒙合璧,清代第一部蒙文词典),从乾隆八年(1743)的《御制满蒙文鉴》(满蒙合璧,进一步规范蒙文音韵)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御制增订清文鉴》(第一部敕修的大型满汉合璧词典),再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满蒙汉三体合璧),又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增补为满、汉、蒙、藏合璧的《御制四体清文鉴》,而补入维文的《御制五体清文鉴》^①(成书于乾隆五十六年)则是一部五种文字对照的分类词书,内容丰富,有历史价值更有其实用价值。延续120余年的6部辞书的编纂,经历了一个从单语到多语的转变过程,既反映了清代社会发展到顶峰,统一多民族国家业已确立,民族交往日增,编修以满语为主的双语乃至多语辞书成为新的必要,也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民族语言的重视,及编修大臣对多种民族语言有相当深入的研究,综合造就了乾隆一朝编修多部辞书的文化繁盛局面^[5]。属于词典类的书还有《清文汇书》《清文补汇》《三合便览》《六部成语》等。北京故宫现藏有50多种清代民族语文词典。

(4) 明清档案

明清档案是清宫留下的珍贵文献,与殷墟甲

骨、敦煌写卷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三大发现。清代末期,存于紫禁城内的内阁大库档案流入社会,这些长期以来密藏宫中档案典籍,始被社会所发现,引起国内外广大学者的极大关注。这些档案除少量明代档案外,绝大多数为清代档案,包括内阁档案、军机处档案、宫中各处档案、国史馆档案,管理皇族及宫廷事务机关如宗人府、内务府、銮仪卫等档案,以及各种舆图等,内容涉及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民族、宗教、礼仪、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等诸方面。这些档案也是珍贵的文物,主要因其本身的文献价值,同时它的规范整肃的外形、精美的装潢、优质的纸墨等,反映了当时的文书制度和文化用品的工艺水平,特别是各种字体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鉴赏价值。

在明清档案中,当年主要存藏于紫禁城内的清廷中枢国家机关档案有着特殊的价值。例如研究宫廷史,内务府档案就相当重要。内务府是管理宫廷事务的机构,其职务是“掌上三旗包衣之政令与宫禁之治。凡府属吏、户、礼、兵、刑、工之事皆掌焉”^②,俗称“皇帝的大管家”。凡皇帝、后妃的衣、食、住、行及巡幸、游乐、礼仪等各种事务,都由内务府来承办。内务府设有总管内务府大臣,都是由皇帝特简的亲信大臣充任。其办事机构庞大,主要有七司、三院,即广储司、会计司、掌仪司、都虞司、慎刑司、营造司、庆丰司及上驷院、武备院、奉宸院。此外,还先后设有附属机构40多个,以分别办理各种事务。内务府的档案大致可分四类:一是内务府上奏的文书,主要有题本和奏折两种;二是内务府汇抄存查的档册,如《红本档》《奏销档》《上谕档》(按:此为内务府逐日抄录的有关内务府事务的上谕档册,与军机处的《上谕档》内容不同)、《来文档》等;三是内务府日常公事档案,如呈稿、咨文、月折、事简及造办处的《活计档》、各宫殿的《陈设册》等;四是造办处舆图房所存的舆图,分天文、舆地、江海等13类。内务府档案起于顺治十一年(1654),迄于宣统三年(1911),共有180多万件。再加上清帝退位,溥仪小朝廷时期(1912—1924)的内务府档39万多件,共计220多万件,排架长度2782米。一个宫廷机构的档案如此大量、完整的保存下来,这和他产生于故宫,典藏于故宫,从未发生过档案流出故宫遭遇损失的历史机缘有关。即便是1933年文

^①《御制五体清文鉴》流传不广,仅有3部精写本分别收藏在北京故宫、雍和宫和沈阳故宫。引自春花著:《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第149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

^②《光绪会典》卷八九。

物档案南迁和 1959 年明清档案并入中央档案馆管理的两次大的档案迁动中,内务府档案(除舆图外)也一直存于故宫。^[6]

这些档案的大多数本来就存在紫禁城内,与宫中建筑物及各个机构连在一起,而且与宫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关,是了解宫廷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宗人府、内务府、銮仪卫等管理皇族及宫廷王府事务机关的档案,对了解清宫典章制度及历史文化有重要价值。内务府所属机构的文件,如南府昇平署所藏的剧本、曲本、戏单,御茶房的脉案、配方,敬事房的宫廷陈设帐,御膳房的帝后膳单等,都是研究宫廷历史文化极其珍贵的资料。故宫藏品中明清两代工艺美术品占很大比重,要考证这些器物的制作,内务府活计档就是一个重要依据。活计档是清代内务府造办处承办宫中各项活计档册的总称,现存雍正元年(1723)至宣统三年(1911)的这类档册 1500 余卷册。档册是清代工艺美术品和画院画家作品最集中的文字史料,其中有某些作品的作者姓名,设计者的姓名,管理人员的姓名,成做活计的品名,皇帝对于器物制作的具体要求和意见等。它对查考清代文物,研究各类活计制作工艺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宫中文化艺术的发展,一些文人的艺术风格和成就,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故宫所藏清代工艺美术品有许多件可以在档册中找到作者是某人,是某年月日开始设计画样、做模型,某日完成,以及陈设地点等。对有的不知其朝年和来源的文物,通过活计档,将文字记载与实物对照,进行综合分析,也可考证文物的朝年与来源。例如朱家潜先生在《清雍正年的漆器制作考》中,根据活计档有雍正十年(1732)曾制做洋漆包袱式盒,现存故宫藏品中,再如档案中多次提到雍正十年谕年希尧所做镶竹漆器、雍正七年江宁织造随赫德进呈的黑漆描金填香炕倚靠背等,而在以往的文物鉴定中,却误将这些漆器定为乾隆年造的。通过档案证实,上述漆器中有的具有较明显的雍正年制的特点,在乾隆年造办处档案上未再有记录,所以可以肯定这些漆器是雍正年制^[7]。

清宫档案类别丰富,例如一批由官方绘制、收集并存放宫中各处的地图、战图、山水图、名胜图等舆图,就很有特色。其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各种清宫舆图即达 7000 多件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存清内府舆图绢绫本 65 帧又 48 册、纸本 97 帧 55 册,大都是清内阁大库旧藏之物;台北故宫存藏舆图 734 件;北京故宫现藏舆图约 2700 余种、2900 余件。仅从上述四家馆藏即可知清宫原藏舆图数量

已逾万余件、册^[8]。这些图和社会上一般画图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仅是融天文学、地理学、测绘学、美术学等多种科学文化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产品,作为官方特意存留下来的档案,它首先具有强烈的政治的历史的属性和特点,它的形成与当时社会的发展密切相连,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直接记录和见证。万余件的清宫舆图,清晰勾画出清朝历史兴衰的印迹。康雍乾时期有代表性的清宫舆图,是作为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主要凭证的 2800 余件舆地图,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康雍乾三朝分别绘制的《皇舆全览图》《雍正十三排》和《乾隆十三排》。治水救灾是有清一代的主要政务之一,这个时期的江河水源图也相当突出,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存有大大小小的江河渠系等水利工程图 350 多件,长 360 厘米、宽 147.5 厘米的《星宿海河源图》与长 7280 厘米、宽 51 厘米的《金沙江上下两游图》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与康乾二帝频繁的巡幸活动相联系,同时形成了大量的行宫图、水陆路程图及部分名胜图、寺庙图等,80% 以上为工笔彩色画图,既是记事图,又是风景图,既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又具有相当的艺术欣赏价值。康熙平定“三藩”的《大军平定吴应麟图》、施琅统一台湾的《平定台湾战图》、乾隆平定新疆的《平定西域战图》等对西北西南等边疆用兵的战事图,也显示了清盛世帝王的宏伟气魄。^[9]

199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记忆工程”,关注文献遗产的抢救与保护,这是世界遗产项目的延续。1999 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内阁秘本档中有关 17 世纪在华西洋传教士活动的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这部分 24 件、约 27 万字的满文档案,主要记载了 17 世纪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其核心内容是曾在当时引起轰动且后来一直为史学界所关注的康熙年间“汤若望案”,历史上称“历法之争”的有关档案。这部分档案还保持了 17 世纪中国古典纸墨式满文文书的原始风貌,对于研究满文的发展历史及东方古代文书均有裨益。2005 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金榜”又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存在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和储备官员的主要途径。金榜是科举考试的最高级别——殿试的成绩榜,也是皇帝颁发的诏令文书之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清代大小金榜 100 多件,都是当年清宫存留下来的珍贵档案文献。2000 年,我国成立“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2002 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玉牒”“清代秘密立储档案”作为首批档案文献,列入“中国档案文

献遗产名录”。

3. 故宫博物院

成立于1925年10月10日的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紫禁城)和宫廷旧藏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宫殿建筑群、古代艺术品及宫廷文化史迹为主要展示内容的大型综合性国家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业绩。驱逐溥仪出宫,使皇权最重要象征的紫禁城内廷向普通民众开放,对于强化民主共和观念、彻底粉碎当时国内复辟帝制思潮有着标志性意义。成立故宫博物院,使象征皇权统治继承性、合法性的清宫旧藏成为人民共有共享的文化财产,并赋予而且不断强化着其民族文化血脉的新意义,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作用。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经历了艰难的岁月,本身有着不平凡的历程,与中国现代革命史、文化史有着密切的关系。1933年初,山海关沦陷。为避日寇劫毁,13427箱又64包故宫文物分五批迁存上海,当时随其南运的还包括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文物珍品6065箱又8包8件,合计达19492箱72包8件。1936年12月,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存沪文物全部转运南京朝天宫保存库。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避免战火,故宫文物自南京疏散长沙、宝鸡、贵阳、重庆、汉中、成都、安顺、乐山、峨眉、巴县等地。抗战胜利后,存西南诸省文物陆续集中重庆,并于1947年6月全部东归南京。故宫文物南迁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时延十年,地迢万里,辗转颠沛,备尝苦辛。新中国成立前夕,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中的一部分被运往台湾,1965年在台北近郊外双溪建立了故宫博物院。此外,从博物院的发展历史或从文物的收藏及流转历程来看,创设于1914年的古物陈列所,既是故宫博物院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与两岸两个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渊源密切。1914年,古物陈列所以紫禁城前朝部分的文华殿和武英殿等处为收藏、保管和展览文物的建筑空间,以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的皇室收藏品为基础,成为中国第一座以宫廷建筑为主体、以皇家收藏为基础的近代博物馆。1948年3月,古物陈列所管辖的紫禁城前朝宫殿及其文物藏品并入故宫博物院。同年4月,随同故宫文物一并南迁的古物陈列所文物正式划归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管,其中部分文物于1948年底迁往台湾,日后与故宫迁台文物共同构成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基本藏品。

“宫”与“院”的合一,是故宫博物院与生俱来的

身份,北京故宫博物院因此成为一座同时兼具宫廷史迹、古代建筑、古代艺术和清宫藏书档案几大特性的博物馆,是世界上极少数同时具备艺术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宫廷文化博物馆等特色且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址保护”“原状陈列”基本原则的博物院和文化遗产。

“一宫两院”的格局是历史形成的。海峡两岸两个故宫博物院的同时存在,这是世界博物馆发展史上极为特殊的事实。两岸故宫的文物藏品同根同源,有着很强的互补性。故宫及其藏品,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它的建筑,它的文物珍品,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基于虽有两个故宫博物院但故宫只有一个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以及两个博物院的收藏都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事实,因此努力保护好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并为弘扬中华文化、使中华文明赓续不断而努力,就是两个故宫博物院庄严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三、故宫学研究对象的关系

故宫学研究对象的故宫、故宫文物与故宫博物院三个方面,又可分三个层次:最外面的层次为所有三个方面及与其相关的丰富内涵;中间的层次是故宫与故宫文物;最核心的层次是故宫。

为什么故宫(紫禁城)是故宫学的核心呢?因为故宫学与敦煌学一样,它的研究首先是从文化遗产的研究开始的。紫禁城从1420年建成至今,虽经多次维修、重建、改建,但仍保持了始建时的基本格局并遗存了许多不同时代的建筑物。它作为我国古代宫殿建筑发展的集大成者,在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最高水平。雄伟壮丽、千门万户的古老皇宫,每天吸引着数万中外游客驻足观赏,又以其深邃的文化底蕴和巨大的多方面价值成为人们深入研究的对象。如故宫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故宫与中国历代宫殿的关系,故宫与满洲建筑的关系,故宫与北京城市规划和其他明清皇家建筑的关系,故宫与明清陵寝的关系,等等。

故宫与故宫文物同属第二个层次,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1)宫中旧藏文物即古代艺术珍品,原藏置各处宫殿,例如书画,在《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中都有原藏宫殿的记载,“三希堂”就是珍藏三件法书名迹的场所。把建筑与文物结合起来,更能加深对皇帝收藏、珍赏的趣味及其他特点的认识。

(2)宫廷历史文物与故宫关系尤为密切,如几座戏台与数千件戏衣道具,可见宫廷娱乐活动;钦安殿、坤宁宫、雨花阁、大佛堂、城隍庙等,可见宫中

宗教和习俗的遗存;“二十五宝”就存放在交泰殿,数千件明清家具及地毯摆放陈设各个宫殿。

(3)大量的明清档案,本来就存在紫禁城内,与宫中建筑物及各个机构连在一起。这些档案中又有大量的不同时代对故宫及皇家苑囿、寺观、陵寝等修建或维修的记载,成为今天修缮所依据的宝贵的资料。

(4)清宫丰富的典籍收藏在有关建筑物,如专建文渊阁存贮《四库全书》,武英殿作为专门的修书处并存贮殿本书,昭仁殿集中宫中的善本,匾额为“天禄琳琅”,五经萃室专藏岳氏校刻《五经》,摘藻堂专贮《四库全书荟要》,养心殿专贮《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宛委别藏》,乾清宫是内廷政务性藏书处所之一,皇史宬、内阁大库、国史馆、实录馆、方略馆、会典馆等都收藏有各自的图书,还有大量图书陈设在各处殿堂以供阅览。

故宫、故宫文物与故宫博物院同为第三个层次:故宫博物院以明清两朝皇宫故宫为依托、为院址,承继了宫廷的遗物与收藏。这一渊源,决定了它是一座同时兼具古代建筑、宫廷史迹、古代艺术、图书典籍与明清档案几大特性,而这几大特性又相互交融难以割裂的博物馆。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的《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明确规定故宫博物院“掌理故宫及所属各处之建筑物、古物、图书、档案之保管、开放及传布事宜”。1950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更名为“国立北京故宫博物院”,6月13日文化部

颁发了《修正国立北京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规定国立北京故宫博物院“掌理故宫及所属大高殿、景山、皇史宬、皇堂子等处建筑物与古物、图书、文献之整理保管、研究、展览等事宜。”

[参 考 文 献]

- [1]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第三章第三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2] 武斌.清沈阳故宫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6:209.
- [3] 冯先铭.中国陶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40.
- [4] 彭安玉.典章制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 [5] 霍艳芳.中国图书官修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480.
- [6] 中国第一档案馆编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 [7] 朱家潜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前言[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朱家潜.清雍正年的漆器制作考[M]//故宫退食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 [8] 齐秀梅等著.清官藏书[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306.
- [9] 邹爱莲.关于清官舆图[M]//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文选(1994.10—2004.10).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谢光前)

On the Concept and Object of Gugongnology

ZHENG Xin-miao

(The Palace Museum,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Palace Museum and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and discipline, Gugongnology integrates arrangement, research, protection and display. Its research objects include the Forbidden City, the Palace Museum relics and the Palace Museum which are interdependent and constitute a cultural whole. Forbidden City is the core of the Gugongnology, related closely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palaces and other royal building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orbidden City relics integrated with the Forbidden City Palace are mostly royal collection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royal furnishings item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ased on the Forbidden City and its royal collections, the Palace Museum takes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rbidden City, the custody, open and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books, archives.

Key words: Gugongnology; The Forbidden City; Forbidden City Relics; The Palace Museum; Research Objects; Relationship